

汉江生态经济带研究回顾与展望

梁小青¹ 杨梅英² 李春侠¹

(1.荆楚理工学院 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荆门 448000;2.荆楚理工学院 图书馆,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已正式成为国家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在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城镇发展、生态补偿等5个方面。针对视角相对分散、主线也不突出等问题,建议今后要把汉江生态经济带放在长江经济带这个更高层级的区域战略格局中,以有相当共识的长江经济带理论研究为指导,结合汉江实际,重点关注新发展理念落实、汉江水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主体功能区规划精准落地以及产业前瞻性等研究。

关键词:汉江生态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回顾与展望

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6-0036-06

党中央十分重视流域治理和开发。一些地方相继提出流域经济带概念,如湖南“湘江生态经济带”,天津“海河经济带”,河南、安徽、江苏合议“淮河生态经济带”等。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湖北同年10月顺势提出“汉江生态经济带”,经与陕西、河南两省协调,很快进入国家层面。相关国家级规划文本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2015)、《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5)、《“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6)、《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2016)。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已列入国家发改委专项规划2017年审批计划。

目前,学术界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研究大致分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城市发展、生态补偿等5大研究领域。笔者结合知网中的相关论文进行梳理,为明晰研究脉络以进一步了解研究进展,同一研究主题下,依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主要观点。

一、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

在2014年、2015年的研究中,有的学者称汉江流域、有的学者称汉江生态经济带。直到2016年,才基本统一称汉江生态经济带。

(一)战略地位

在国家区域版图中的地位。秦尊文2014年^[1]提出,汉江联结着华中、中原、西北、西南4大经济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雷斌2015年^[2]认为,汉江流域是连接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经济走廊。肖金成等2016年^[3]认为,在“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战略中,汉江生态经济带是东部经济能量辐射中西部、北方地区的二传手。

在长江经济带的地位。目前学界共识是,如果汉江生态经济带能够建成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经济高效的生态走廊,将极大支撑长江经济带腹地拓展。以秦尊文^[1]、肖金成等^[3]等为典型代表。

在鄂陕豫三省地位。由《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可知,在“两圈两带”总体战略体系中,汉江生态经济带既与长江经济带并列,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二圈”(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重要连接线、发展轴。吴传清等2014年^[4]指出,汉中、安康、商洛三大循环经济聚集区,将构建起陕西总体发展战略之生态型产业发展新体系。《河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加强周边省份合作、积极

收稿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荆楚理工学院国家基金预研项目(Y Y201803)

第一作者简介:梁小青(1968—),男,湖北汉川人,教授,主要从事流域治理与区域生态文明研究。

参与跨省域经济区建设、共同打造的三大高层次区域合作发展平台中,汉江生态经济带位居其中。

(二)政策建议

第一,应着眼全局。吴传清等 2014 年^[4]提出了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必须把握三大战略重点和五大制度创新。三大战略重点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产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城镇带建设与新型城镇化。黄征学 2015 年^[5]提出了“生态问题用空间解决,空间问题用时间解决”发展总思路,并具体提出集中发展、培育中心,基础先行、航运为先,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上下协同、生态共保等方向性建议。肖金成等 2016 年^[3]设计了“一核、两轴、三区、多节点”空间布局构想,并在 2018 年^[6]进一步把发展思路具体化为五大建议:生态经济引领、中心城市带动、综合交通保障、发展特色产业、开放合作共赢。

第二,着眼长江经济带。秦尊文 2014 年^[1]建议把汉江流域纳入到长江经济带;将汉江水道、江汉运河纳入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体系,围绕江汉运河开发新的经济带、经济圈,加大对汉江中下游生态补偿和综合开发支持力度。

第三,着眼全流域。张静 2014 年认为^[7],调水极大制约着工业转型升级、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民生改善等,建议整合各项转移基金,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梁小青等 2018 年^[8]提出了政策建议:保障上游来水、研究丹江口水库洪水蓄水方案、库区多目标科学调度、务实论证各类补偿工程、针对潜在生态影响建立中长期跟踪监控机制、逐步完善“三长”责任制。

二、关于产业发展研究

(一)生态文化旅游是重头戏

雷礼锡 2011 年^[9]认为,环境美学研究在中国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但实质上偏重城市,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本质与整体战略发展角度所做的研究尚欠深入。为此,结合汉江流域农业文化与农村环境发展状况,从农业生活方式与诗性文化、田园性与城乡一体化、生态农业与诗意乡村等方面,探讨了当前农村环境美学建设的基本目的和原则。

余硕 2014 年^[10]依托公共池塘治理理论,聚焦跨行政区域的森林资源开发风险,分析了经济带跨行政区森林生态旅游开发面临的主要风险,遵循“生态为内核、智慧为手段、文化为驱动”理念,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的森林生态

旅游策略。

朱运海 2016 年^[11]通过梳理相关政策和文献,提出汉江流域湖北段具有比较优势与旅游开发价值的 8 大文化,建议实施以汉江为发展轴、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重点景区为抓手的“点轴发展”战略,并针对文化旅游开发面临的四大难题,提出了策略性建议。

龙雨萍等 2017 年^[12]借鉴文化线路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研究了汉江流域古村镇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同年^[13]还构建了一个着眼资源禀赋、旅游开发和客源市场等 3 方面、20 个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以汉江流域湖北段三国文化区、道教文化区等 6 处文化旅游区为例进行潜力评价和排序、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产业现状评估

李晓翠 2014 年^[14]实证研究了汉江流域湖北段 2012 年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运用超效率 DEA 模型对 32 个县域的一二三产业及 GDP 相对发展效率,认为目前汉江流域开发存在区域分割、各自为战、区域协同不够等问题,建议加强区域间合作,以提高资源利用率。

王宇波等 2017 年^[15]根据产业协同发展等相关理论,选取 14 个城市(湖北 10、陕西 3、南阳)的相关经济发展数据,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引力模型、区位熵等 3 个指标,度量分析了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建议通过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加工、汽车等 3 大产业带,逐渐实现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变。

张铮等 2017 年^[16]则依据产业布局相关理论,运用产业同构系数、经济联系强度、产业专业化水平 3 个指标,分析了前述 14 个城市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三大建议:实现城市多中心发展,深化合作、错位竞争、共同发展,加大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

同时,李云芳等 2014 年^[17]研究发经济带内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牛丽丽等 2015 年^[18]针对经济带内体育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 SWOT 分析。

(三)产业政策

蒋国财等 2013 年^[19]实地调研了经济带内建设项目,提出了农发行信贷支持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重点领域:绿色环保项目、服务实体经济、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建设、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开发,以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引领先导作用。

李捷 2015 年^[20]以襄阳市为例,结合襄阳在汉

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新定位,着眼经济新机遇、金融新需求、银行新作为,分析了城市功能新定位带来金融业务的新需求,剖析了金融服务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的现状、做法和问题,提出了金融服务襄阳城市建设的构想。

襄阳财政局课题组2017年^[21]围绕把襄阳建设成为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财税体制改革总目标,提出了四大财政对策: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质量全面升级;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创新财政管理机制,提升财政运行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完善对襄阳及汉江中下游的生态补偿机制。

三、关于绿色发展研究

关于经济带绿色发展,学术界尚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涉及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设计、发展水平评估、路径选择等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稀少。

(一) 指标体系与水平评价

王礼刚等2018年^[22]选取经济带内9个城市(湖北襄阳、十堰、孝感、随州、荆门,陕西商洛、安康、汉中,以及河南南阳)“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构建了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是基于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二是基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增长质量、环境治理、绿色生活、资源利用等四个维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态势,表现出“核心一边缘”空间分布特征,襄阳综合绿色发展水平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核心城市。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内,经济带沿线城市忽视汉江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和生态容量的有限性,环境治理一度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环境“账户”透支严重;同时认为,经济带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未来将进一步凸显,核心城市扩散带动效应可能减弱。

(二) 机制构建与提升路径

戴胜利2014年^[23]研究了汉江生态经济带节能减排利益共享机制,分析了经济带各行政区域之间节能减排利益冲突现状,剖析了利益冲突深层次原因,认为相关利益协调机构是基础,经济带利益共享系统由沟通协调、利益分享、费用分摊、利益补偿、冲突仲裁等组成。

张静2016年^[24]提出汉江生态经济带要“在生态建设和转型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并针对性提出了建议:要在国家、省、市三级理顺流域协调机制,国家层面推进区域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省级层面建立高层协商对话机制以定期研究重大问题,市级层面建立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同时,努力构建循环产业廊道、开发生态旅游品牌、加强生态建设合作、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王礼刚等2018年^[22]提出了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三大路径。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差异化发展,将安康—商洛段定为“水源保护与特色产业区”,十堰—南阳段定为“库区保护与绿色产业区”,襄阳—孝感段区域定为“中下游重点发展区”,分门别类地制定差异化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完善全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的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与预警应急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以经济带主要城市为重点,大力发展有汉江特色的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关联性强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三) 产业遴选与工作思路

梁小青在多年汉江流域实地踏勘调研基础上,于2017年产出相关成果^[25~27]。遴选绿色产业要遵循三个“有利于”原则:要有利于经济结构向轻资产转型,因为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要有利于涵养水源与土壤改良,既要节水流,更要开水源;解决好农田土壤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有利于文化遗产与地域特色,任何具汉江流域的乡愁规划,一定要充分考虑工业化这个最大的现实。同时提出经济带发展绿色产业的三大工作思路。好水好风光,建设海绵流域以涵养水源,要给河道松绑、加强小流域治理。好土好秧苗,发展回归传统的环境友好型农业,要引导自然农耕法逐步回归,逐步取代美国式现代农业。发展滨水生态产业,建设媲美清江画廊的汉江绿色走廊。

四、关于城市发展研究

(一) 城市群与城镇带

叶青2014年^[28]提出了汉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三层分类:以襄阳为中心,以十堰、荆门、随州为流域副中心,并提出由天门、潜江、仙桃组成的汉西城市群概念,主张把“两圈两带”过渡到“三圈三带”(武汉、宜昌、襄阳圈,长江、汉江、清江带),以充分发挥武汉、宜昌、襄阳辐射带动作用。

冯旺舟2014年^[29]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汉江流域

特色生态城镇带的建议;着眼全流域的城镇带布局、城镇骨架体系、立体交通体系、旅游业。

廖伦建 2016 年^[30]将城市群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为高职教育资源共享研究。在廖伦建看来,襄(阳)十(堰)随(州)城市群整体上包括十堰、襄阳、随州、荆门、神农架林区。建议整合现有各市 5 所职业教育集团,以组建襄十随职业教育总集团,优化区域职业教育资源。

(二)城市效率与竞争力

田美玲等 2016 年^[31]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空间表达和空间插值方法,多层次划分九城综合竞争力:襄阳、十堰第一层,南阳、随州、荆门和孝感第二层,汉中、安康和商洛第三层,并特别建议陕西三城(汉中、安康、商洛)组建空间成长三角。

张静 2017 年^[32]在测度 2003~2015 年全流域 11 城(前述 9 城加武汉、荆州)城市效率后认为,经济带内部空间自相关现象不显著,建议强化政策规划、促进协调发展。

王冰玉 2017 年^[33]以经济带内湖北 10 城为研究对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定城市质量,认为除武汉外,襄阳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城(孝感、荆门、十堰、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神农架林区),建议以汉江为纽带,以武西客专汉十段、汉丹铁路为依托,做大做强“沿汉江汽车产业走廊”,增强襄阳实力。

(三)流域内主要节点城市

杨晓永等 2011 年^[34]提出了汉中市一江两岸开发建设应体现“西北江南”风貌特色的思路,建议把汉江城区段划分为自然生态区、游览功能区、休闲娱乐区、水上游览区等 4 大功能分区。蒋建军 2015 年^[35]认为,水源保护是安康第一要务,是涉及中国大面积社会安全稳定的大问题。安康发展战略应该把生态补偿看成推动理念大转变、产业大提升、利益大调整、生活方式大改变的难得机遇。在强调“不开发就是最好的开发新理念”同时,特别提及黄洋河这条安康唯一没有开发的原生态河流。

石智雷等 2011 年^[36]通过分析南阳市水资源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议逐步建立节约用水的宏观引导机制,以保障城市化进程中地表水、工程调水与地下水、城市供水与乡村供水、行业供排水的协调统一。

杜汉华 2015 年^[37]认为,作为汉水流域历史上出现最早、为时最长的中心城市,南阳只要能够找到突破性发展的正确路径,引进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通过引领汉水流域的文化旅游产业,完全有可能再

次率先成为汉水流域的中心城市。

湖北相关研究聚焦十堰、襄阳、荆门三大节点城市。十堰市委政研室调研组 2014 年^[38]明确提出,十堰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目标,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设。田运科等 2016 年^[39]分析了十堰建设生态文化旅游中心城市的诸多优势,并提出经济带内各个城市要错位竞争。雷斌 2015 年^[2]提出了襄阳三大发展路径,即“合纵”,建设“七省通衢”交通枢纽;“连横”,先行先试体制机制创新;“协奏”,搭建流域城市合作平台。李柱等 2017 年^[40]基于流域中心城市内涵、特征、标准及指标体系的理论分析,探讨了襄阳建设经济带中心城市的路径措施。梁小青等 2009 年^[41]以荆门市为例,提出了重化工城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并分别于 2015 年^[42]提出,要以“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切入点,围绕生态经济产业形态、水资源开发利用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前期研究;2016 年^[43]提出“十襄荆生态文明试验区”、汉江海绵流域等概念。

五、关于生态补偿研究

(一)补偿机制

邓远建 2014 年^[44]认为,理清流域生态利益关系是生态补偿前提,不切实际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只能导致失败,建议围绕“造血”式补偿目标,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作用机理及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李雪松 2014 年^[45]提出了四种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并认为,我国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环境尚未成熟、所需条件如明确的产权界定、完善的交易机制等均未形成,应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为辅措施,实现补偿效率最大化。

窦世权 2016 年^[46]提出了中央纵向财政转移有助于主体利益均衡,每年约需 120~146 亿补偿资金,汉江生态补偿机制应结合“精准扶贫”,创新补偿方式、途径。认为,生态补偿将超越单纯的生态建设演变为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补偿理论与政策

李国平等 2013 年^[47]界定了生态补偿概念,讨论了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标准,分析了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依据,评述了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方法,明确提出,现实中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依据与核算方法的多样性,导致同一案例生态补偿核算差异明显,不利于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他们进一步于 2015 年^[48]运用机会成本法,结合汉江水源地现

行补偿政策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指出现行政策投入与水源地实际损失的差距后,从4个方面提出了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周晨等于2015年^[49]以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郑州市为例,通过支付卡式CV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其边际效应,认为受水区居民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较高的支付意愿,针对水源地生态环保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建议中央政府加大纵向支付力度、逐步建立受水区、水源地横向支付机制。

(三)补偿标准

岳忠羽于2012年^[50]选取4方面、28项指标,构建汉江流域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析后建议,现阶段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资金应首先用于上游水源涵养和环境污染治理,重点任务有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水土保持和生态移民。

李小燕等2012年^[51]针对目前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中存在的数据获取单一、不同河段标准一致、重复计算和指标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提出了基于汉江流域具体情况的生态补偿指标体系,认为汉江不同河段在北向调水中存在着明显的贡献差异,理应采取不同补偿标准以体现不同贡献。

周晨等2015年^[52]通过分析汉江水源地2002~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全面评估了水源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动态变化,确立了生态补偿的上限标准、分摊机制和受水区支付标准,为确立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激励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撑。

李国平等2015年^[53]从区域发展失衡的视角出发,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产权理论及外部性理论与方法,研究了汉江水源地、受水区生态补偿标准及补偿问题,分别测算了2012年汉中、安康、商洛为保护水源损失的排污权价值,依序应补偿59.98亿元、38.06亿元、78.26亿元,合计176.30亿元。

六、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汉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至少存在着如下5方面不足:首先,汉江生态经济带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作用研究不足,至于如何通过汉江开发开放以拓展长江经济带腹地空间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其次,流域经济的理论性研究不足,过多关注单一问题实证

研究,尚未涉及流域生态经济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第三,绿色发展的系统性研究不足,较多关注水资源环境,尚未涉及流域内劳动力、科技发展、创新创业等要素资源;第四,产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不足,尚未涉及工业经济结构整体分析及其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尚未挂钩特色小镇;第五,汉江全域的总体性研究不足,视角多样、相对分散,除国家发改委等极个别研究人员着眼汉江全域外,各省学者均“自扫门前雪”,尚未形成一条着眼整个汉江流域的明确的研究主线。

今后,要在长江经济带这一内涵更丰富、空间更广阔的更高一级区域战略布局中,研究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独特地位与重大作用,直接以有相当共识的长江经济带理论研究为指导,结合汉江实际重点关注以下5个领域。

(一)加强汉江流域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研究

作为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生态经济带必须凸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理念要求形成全流域新的空间布局,围绕产业创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协调发展理念要求加强对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发展研究。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做好“水文章”,构建可操作的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开放发展理念要求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全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做好“水产业”

无论长江与汉江,流域资源的核心是水。水环境治理是流域治理的核心。汉江流域水资源研究因南水北调,显得尤其紧迫。应建设汉江海绵流域破解水危机,通过低洼谷地“人退水进”,尽可能蓄积水源,推进小流域治理,加大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力度,试点海绵城市,实现“小雨不湿鞋、大雨不内涝”。应加强水环境第三方治理研究,通过环境服务外包,推动流域治理走向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治理成本。

(三)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至少三条路径。一是产业绿色发展破解工业污染。用“减法”压缩重化工等传统产业,用“加法”壮大现代服务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以沿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改造为抓手,推行绿色制造、循环经济。二是城镇绿色发展破解生活垃圾污染。垃圾要分类,以源头管理控制垃圾总量;规模要适度,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形态要适宜,“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三是堵疏结合破解农村面

源污染。防止城市和工业“三废”下乡产生外源性污染,以“一控二减三基本”遏制内源性污染,借力农业信息化实现“三产融合”,以“三生共赢”振兴乡村。

(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地研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是在 2014 年 12 月,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早在 2010 年即发布。时过境迁,汉江现实需要与当初规划已大相径庭,亟待因时、因地制宜的精准落地研究。关键是加强多规合一研究。遵循《“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 号)基本要求,研究各市县行政区不同江段特点,建立汉江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在“合”字上下功夫,在“用”字上做文章。同时加强新型城镇化与特色小镇研究。在限制开发区域控制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强度;严格划分城镇发展空间、农业与生态用地空间,彰显不同地市个性特色;特色小镇建设既要立足现有基础,又要充分考虑工业化实际,更要充分考虑生态诉求。

(五)立足“中国制造 2025”,加强产业前瞻性研究

第一,立足武汉“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现有基础,优化产业布局,逐步累积竞争优势;强化绿色设计,大力推动绿色制造;立足汉水文化,弘扬倡导工匠精神;专注市场细分,潜心培育“隐形冠军”。第二,加大产业前瞻性研究。充分发挥汉江流域高校资源密集优势,做好人才储备,立足实际需求培养人才,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第三,顺应绿色金融新趋势,探索项目融资中环境成本核算,将绿水青山的隐性收益和污染的隐性成本显性化,探索重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 [1]秦寿文.将汉江流域纳入到长江经济带的建议[J].中国国情国力,2014(2).
- [2]雷斌.襄阳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5(3).
- [3]肖金成,申兵.汉江生态经济带的发展与合作[J].中国经贸导刊,2016(3).
- [4]吴传清,万庆.在改革创新中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J].中国国情国力,2014(10).
- [5]黄征学.加快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总体思路[J].中国经贸导刊,2015(8).
- [6]肖金成,申兵,黄征学.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方略[J].中国经济报告,2018(3).
- [7]张静.将汉江经济带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J].政策,2014(11).
- [8]梁小青,杨梅英.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态势及其对策[J].西部论坛,2018(1).
- [9]雷礼锡.农村环境建设的美学使命——以汉江流域农业文化与农村环境建设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
- [10]余硕.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中跨行政区森林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研究[J].荆楚学刊,2014(6).
- [11]朱运海.汉江流域湖北段特色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2).
- [12]龙雨萍.汉江流域文化线路上古村镇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
- [13]龙雨萍,张中旺.汉江流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6).
- [14]李晓翠.汉江流域湖北段县域产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36).
- [15]王宇波,张铮,景思江.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7(3).
- [16]张铮,王宇波,熊雨娟.汉江流域产业发展差异化战略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7(8).
- [17]李云芳,刘刚.汉江生态经济带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4(7).
- [18]牛丽丽,张华江,徐圣霞.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体育产业发展战略 SWOT 分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10).
- [19]蒋国财,汪勇,朱立周,等.信贷支持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研究[J].农业发展与金融,2013(2).
- [20]李捷.对金融服务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的思考——以襄阳市为例[J].武汉金融,2015(9).
- [21]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局课题组.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财政对策研究[J].中国财政,2017(20).
- [22]王礼刚,吴传清.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4).
- [23]戴胜利.汉江生态经济带节能减排利益共享机制构建[J].荆楚学刊,2014(3).
- [24]张静.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N].湖北日报,2016-08-08(12).
- [25]梁小青,杜华清,肖习明.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思考[J].领导科学论坛,2017(10).
- [26]梁小青,常昌龙,伍德春.发展绿色产业应对汉江荆门流域生态危机的思考[J].时代经贸,2017(10).
- [27]梁小青.汉江中下游绿色产业发展思考[J].长江技术经济,2018(1).
- [28]叶青.发展汉江生态经济带的几点建议[J].学习月刊,2014(6).
- [29]冯旺舟.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中特色生态城镇建设研究[J].荆楚学刊,2014(3).
- [30]廖伦建.汉江经济带襄十随城市群高职教育资源共享研究[J].当代经济,2016(9).
- [31]田美玲,方世明.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及时空演变[J].统计与决策,2016(9).
- [32]张静,丁斐.基于 DEA-ESDA 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城市效率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7(9).
- [33]王冰玉.湖北省汉江经济带城市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初探[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5).
- [34]杨晓永,雷保寿,杨利霞.汉中的一江两岸开发建设的思路探讨[J].中国水利,2011(4).
- [35]蒋建军.对安康在汉江水源保护中的地位与发展思路创新的一点认识[J].陕西水利,2015(1).

[11]范邦邦,郭琪,贺灿飞.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政策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J].经济地理,2015(5).

[12]毕学成,苏勤.生态经济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基于 Citespace III 的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13]王娟娟.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5(10).

[14]杨继瑞,罗志高.“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协同的思考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7(12).

[15]郝寿义,程栋.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的区域合作机制重构[J].改革,2015(3).

[16]王维,陈云,王晓伟,文春生.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差异时空格局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10).

[17]李强,高楠.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8]崔凯,冯献,郭静利.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关系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5).

[19]郑建锋,曾冰,孔令池.城镇化—金融集聚协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7(4).

[20]彭迪云,刘畅,宋一凡.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与时空演变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18).

[21]徐维祥,张凌燕,杨蕾,刘程军.多维邻近下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J].经济地理,2017(9).

[22]周成,冯学钢,唐睿.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6(3).

[23]时朋飞,李星明,熊元斌.区域美丽中国建设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关联性测度及前景预测——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8(2).

[24]熊元斌,时朋飞,李星明.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动态

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7(9).

[25]王佳宁,王立坦,白静.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要素:11 省(市)证据[J].重庆社会科学,2014(8).

[26]吴传清,董旭.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27]成长春.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8]王圣云,翟晨阳.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网络结构与空间合作路径[J].经济地理,2015(11).

[29]段学军,虞孝感,邹辉.长江经济带开发构想与发展态势[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10).

[30]刘传江,赵晓梦.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时空演化及提升潜力[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11).

[31]彭迪云,刘畅,周依依.区域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6(7).

[32]任胜刚,袁宝龙.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找寻[J].改革,2016(7).

[33]张宇,曹卫东,梁双波,胡燕燕.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5).

[34]郭庆宾,刘琪,张冰倩.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国际 R&D 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12).

[35]李雪松,张雨迪,孙博文.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

[36]卢丽文,宋德勇,黄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长江经济带的 108 个城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7(1).

[37]刘友金,易秋平,贺灵.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7(9).

责任编辑 吴爱军 E-mail:Wajun800@126.com

(上接第 41 页)

[36]石智雷,谭宇.水资源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分析——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37]杜汉华.谈南阳汉水流域中心城市的建设[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38]十堰市委政研室调研组.把十堰汉江生态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思考[J].政策,2014(2).

[39]田运科,李垣璋,郑妍妍.十堰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文化旅游中心城市的优势[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3).

[40]李柱,张翌.流域中心城市特征与建设对策研究——以襄阳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8).

[41]梁小青.重化工城市“两型社会”建设实证分析——以荆门市为例[J].理论月刊,2009(9).

[42]梁小青,蒋丹.荆门因应汉江水文情势深刻变化的思考[J].荆楚学刊,2015(1).

[43]梁小青,李春侠.建设生态荆门的经济形势、现实矛盾和政策思路分析[J].全国商情,2016(5).

[44]邓远建,肖锐,刘翔.汉江生态经济带水源区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研究[J].荆楚学刊,2014(3).

[45]李雪松,李婷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4(Z1).

[46]窦世权,刘江宜.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究[J].绿色科技,2016(12).

[47]李国平,李潇,萧德基.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与测算方法探讨[J].经济学家,2013(2).

[48]李国平,王奕淇.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环保与补偿政策解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5).

[49]周晨,李国平.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郑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5(6).

[50]岳思羽.汉江流域生态补偿效益的评价研究[J].环境科学导刊,2012(2).

[51]李小燕,胡仪元.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现状与指标体系设计——以汉江流域为例[J].生态经济,2012(11).

[52]周晨,丁晓辉,李国平,汪海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视角[J].资源科学,2015(4).

[53]李国平,王奕淇,张文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资源科学,2015(10).

责任编辑 吴爱军 E-mail:Wajun800@126.com